複写希望文献の書誌情報
京都大学言語学研究室　武内康則　2008/10/20

H. 福赫伯、黄振華 訳(1985)「契丹語考」『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第 5 集:65-83.

G. 道爾弗、黄振華 訳(1985)「評福赫伯著『契丹語考』」『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第 6 集:139-141.

簡体字/ピンイン

H. 福赫伯、黄振华 译(1985)「契丹语考」『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 5 集:65-83.
H. Fuhebo, Huang Zhenhua(translator) (1985) Qidanyukao. *Minzuyuwenyanjiu Qingbaoziliaoji*. 5:65-83.

G. 道尔弗、黄振华 译(1985)「评福赫伯着『契丹语考』」『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 6 集:139-141.
G. Daoerfu, Huang Zhenhua(translator) (1985) Ping Fuhebozhu "Qidanyukao". *Minzuyuwenyanjiu Qingbaoziliaoji*. 6:139-141

契 丹 语 考

H. 福赫伯 著
黄 振 华 译

本文原题《论辽国语言关系研究》（Bemerkungen zu den sprachlichen Verhält-nissen in Liao-Reich），载于1969年《中亚研究》（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第8期，第7—43页。（作者现任西德巴伐里亚科学院院长。——译者）

1969年《东方学术论丛》（Abh.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第三十八卷第1期发表了门格斯（Menges K.H.）所作《通古斯与辽》（Tungusen und Liao）一文。这是最近几年讨论契丹语言的一篇最令人感兴趣的文章。作者精心研究了《辽史》所见人名、部族、官称和其它语词，认为可以借助于通古斯语来确定其语源。辽的部族有一部分（尤其是在极北）操通古斯语，这当然是不成问题的，特别是女真族，他们的语言属于通古斯系，对通古斯学（Tungusologie）是很重要的。因为除了满语以外，女真语是唯一具有文字和文献的、有历史可考的通古斯语。我们之认识这种语言，乃是通过一些重要的碑铭，不过主要还是通过《金史》和12—13世纪其它著作中提供的汉文转写，以及时代较晚的、16世纪之初的字书和对译文献提供的简短资料。但是对于门格斯认为有通古斯成分的契丹语来说，情况就要糟糕得多。迄今解读契丹字的一切尝试都已失败，而汉文转写的（主要是在《辽史》中）契丹语词可以通过汉文字书认知者，又为数不多。首先是这类词汇材料既不系统，又无代表性，因为那都是散见于《辽史》而多少带点偶然性的。并且还要考虑到，契丹语中还有来自别的语言的借词，可能是来自蒙古语、突厥语和通古斯语的借词，所以上述词汇有一部分可能不是契丹语原词，而是这类借词。女真语也有这种情况。在12—13世纪的古女真语中，便有不少蒙古语词干；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的新女真语借自蒙古语的词汇，数量还更多。所以当我们用蒙古语、突厥语或通古斯语来解释契丹语源时，这样推导出来的词源很可能没有代表性，因为这是从偶然凑在一起的词汇材料中得来的。门格斯也同伯希和和别的学者一样，认为契丹语是古代南蒙古语。村山七郎在《契丹字解读的方法》（见《言语研究》第十七卷，18号，1951年，第47—70页）一文中，试图把所谓契丹小字同突厥卢纳文字连系在一起，而用蒙古语来释读〔又见村山七郎：《契丹字与突厥卢纳文字的关系》（Der Zusammenhang der Kitan- Schrift mit der türkischen Runenschrift），载于托干（Togan Z.V.）主编的《第22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Second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第二卷第386--398页（1957年）〕。但是由于缺乏连贯可读的文献，我们还是不能明了契丹语的语法和句法，而只是认识一堆偶然得到的语词，这就不能完全明了其真象。诚然，也有一些材料涉及契丹语句的词序，那是与阿尔泰语相近的，不过也同朝鲜语和日本语相近。总之，材料是十分贫乏的。我们要感谢门格斯的是，他以渊博的阿尔泰语（尤其是通古斯语）知识，找出了契丹语中那些出自通古斯语的成分。至于契丹语的问题，还是和40多年以前李盖第（Ligeti）发表的《契丹及其语言》〔(A Kitai nép

és nyelv)，见1927年《匈牙利语》(Magyar Nzelv) 第二十三卷，第293—310页〕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篇就在今天也还很有价值的文章，我要感谢董布拉第(Dombrady S.) 把它译成了德语。李盖第就曾推断契丹语具有蒙古语的性质，但是没有像门格斯现在所做的那样，看出契丹语中具有通古斯语成分。不过对于一切游牧民族集团来说，在原则上都得考虑有着各种不同语言和文化成份的问题，对于契丹来说完全是这样。便是人们常常确认为“蒙古族”的室韦，最近据拉齐涅夫斯基 (Ratchnevsky) 研究，也有这种情况〔见所著《室韦是蒙古族吗？》(Les Che-wei étaient-ils des Mongols)，载于1966年《汉学杂志—敬献戴密微先生》(Mélanges de Sinologie offerts à Monsieur Paul Demiéville) 卷一，第225—251页〕。

门格斯在文章中引用的契丹语词材料，乃是出自卫特夫 (Wittfogel) 和冯家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代》(History of chinese socieit, Liao, 1949年) 一书。他所作出的大量词源解释，与此书大不相同，当我有下文就某些语词、官衔和名称提出另一种解释时，我是有保留的。因为我不是阿尔泰学家，尤其是不懂通古斯语。我的看法最好是当作一个汉学家的看法来对待，汉学家也许比阿尔泰学家对汉文的上下文关系 (Textzusammenhang) 更感兴趣，因此有时可能得出与阿尔泰学家不同的结论。我也只能提出一些解释辽代契丹语词的建议，以供阿尔泰学家讨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现有的知识水平是做不到彻底解决的。

这里我首先还要谈谈方法上的问题。门格斯的文章有几处（见原文第29、42页）提到，他相信用汉文转写的非汉族语词有表意的意思，即用以转写该语词的汉字符号也表示此词的意义。但是这样的意译法一般是极其少见的。即便能够勉强找出一些音译汉字说它有含义，并且幻想它是表示某些外族语词的意思，但是在我看来，真正名副其实的意译在任何时候都只是例外。根据我的仔细观察，汉文史籍中散见的外族语言材料，尤其是元代的材料，乃是数以千计的汉字音译人名和术语，很少有真正的译意字，例如象 Temür 这样常见的名字，也不象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总是用“铁”字译写，用“铁”字译写只是偶然现象，更多的是用与“铁”音相当的其它汉字。外族族名的翻译尤其是这样。既然意译的情况是例外，由此便可判断：一旦某个外族名称使用了汉字意译，那一般都会在史料中加以说明；若不是这种情况，便得把那些汉字看作纯语音符号。

本文使用的缩写字全称如下：

CS——《金史》，百衲本

CTKC——《契丹国志》，万有文库本

G——葛鲁贝 (Grube W.)：《女真语言文字考》(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rčen, 1896年)

Ju.——女真语

K——高本汉：《中国文》(Grammata Serica, 1940年)

LS——《辽史》，百衲本

M——门格斯：《通古斯与辽》(Tungusen und Ljao, 1968年)

Ma.——满语

Mo.——蒙古语

TME——道尔弗 (G.Doerfer)：《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n Neupersischen, 四卷，1963—1967年)

tu——通古斯语

tü——突厥语

WF——卫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代》（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1949年）

WT——《五体清文鉴》，1957年

yPL——《燕北录》（见《说郛》）

有关期刊缩写则遵从《远东》（Oriens Extremes）杂志使用的代号。

一、汉语语词

有些被门格斯视为外族语言而认为源出于阿尔泰语的语词，汉学家则认为是无可置疑的汉字：

1.渤(勃)海　门格斯的文章一再提到渤海，说它是一个民族，还就此杜撰了一个通古斯语源（见《通古斯与辽》13—14页）。但是这个词显然是汉语。渤海的意思等于“大海”（Weites Meer），早在公元前便用来表示直隶湾（Golf von Tschili），就在今天也还偶尔这样使用。仅在《史记》一书中，渤海作为海湾和近海府县的名称就曾出现十四次以上（《通古斯与辽》第13页也曾正确地指出这一点。）作为人种语言统一体的渤海族是从来没有的。公元712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包括朝鲜北部和满洲大部分，名字就叫渤海国，那也是因为这个国家位于直隶湾即渤海的北岸。渤海这个名称就象“唐”、“宋”、“西夏”一样，显然也是汉语的，因此不能从阿尔泰语去找语源。门格斯说渤海国中有很多通古斯民族成分，那当然是完全正确的。白鸟库吉就曾对渤海的通古斯民族成分作过有趣的研究〔见所著《扶余国主东明王传》，(The Legend of the king Tungming,the Founder of Fu-yü-kuo)，载于MTB 10（1938年）第1—39页〕。他在第20—21页指出：见于唐代记载的渤海国人名有许多含有“蒙”字，此字即相当于蒙语 mangga（难、强、重）。后期女真语也有此字，可以补充白鸟库吉之说。格鲁贝的《女真族语言文字考》第702字即Mang-ha，其意义与满语相同。

2.步摇冠　这是契丹礼帽之称。门格斯在文中（见38页）说“此词系突厥语”。实则系纯汉语词，意译即“行走时摆动的帽子”。石太安亦曾正确地理解为“平衡步伐的帽子”（见1940年《通报》第35期第77页）这种形式的帽子和称呼早就见于汉代的史籍。请见百衲本《汉书》卷四十五13b.7（附详细说明）和《后汉书》卷十下，27b，2；卷三十，18a，4。诸桥所编《大汉和字典》卷六（682Ⅲ）对此有详解。因此，认为这个语词源出于突厥语是错误的。

3.部落　门格斯在文章中（见39页）说：“阿尔泰诸族咸以部落为特征”。这里要指出的是：部落系指人的集团，而且不限于阿尔泰族。此词纯粹是汉语，其意义即 abteilungs-weise（部）siedeln（落），也有“居无定处”的意思。“落”字单解表示“村落”〔见马修斯（Mathews）的《字典》‘村落’、‘落第’条〕。仅举此一点便不能相信“部落”是突厥语bölük的音译，因为“部落”一词的构成和含义都是纯汉语。《汉书》提到外族就用这个称呼（卷七十二，25a，10），《后汉书》卷七十六，34b，5（而且还是提到南蛮的一章）也用以表示羌、氐、夷等族。或许有人硬要坚持说，“部落”一词在汉代就是一个外族语词，后来此词〔指古汉语词——因为‘汉代语言’比高本汉所谓的‘上古汉语’(archaic chinese)要近得多〕近似发音为 bǎg-glak（同门格斯的说法相反，‘部’字见于高本汉的

《中国文》第999字），后又转化为突厥语 böluk、böläk 和蒙古语形式。这种说法是完全无视下述事实：汉代与汉族接触的草原民族还没有一个可以肯定说是操使阿尔泰语的。

4.酪粥、乳粥　“酪”的意思是“凝乳”、“乳脂”、“油脂”、“凝乳块”等等，也表示牛奶产品。正如门格斯援引孔好古所正确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象征着东西文化交流的古词，可能是在汉代通过匈奴传给汉族的（古汉语音 glak）。此词在汉语原来就是外来语，但是“粥”和“乳”则纯粹是汉语。“酪粥”就是“用（某种）牛奶产品制作的粥”，“乳粥”就是“用牛奶制作的粥”。蒙古语 araja（奶酒）在语音上则与此无关，因为第一，蒙古语 araja 只有一个元音 a 是古汉语的 *glak（酪）也有的，而别的语音在古汉语则无；第二，对 araja 中的 a- 还不能加以说明；第三，门格斯引证的蒙古语形式 *araju 也很难站住脚。这也表明很难说汉语的“乳粥”同阿尔泰语有词源关系，因为它们的语音连系是如此之弱。

二、语词考证

1. 鲜卑语是否属于蒙古语族

根据几个用汉文转写的语词，就来确定一个民族的语言系属，这是很困难的。我看吐谷浑（鲜卑的一支）的情况也是这样。门格斯依据伯希和的有关论文（见《通报》1920年第20期第326—330页；1929年第26期第251—252页），便说鲜卑是蒙古族。照伯希和的看法，专用名词的词尾经常使用的“豆”，可能就相当于蒙语形容词后缀 -tu。可是还有五个词是用汉字转写并附有释义的。下面我们就来加以讨论。

（1）处可寒　百衲本《宋书》（卷九十六，1b）说“处可寒”的意思是“尔官家”。毫无疑问，此所谓“可寒”就是官家头衔 qaqan、qaɣan。但是这个头衔词既见于突厥族，也见于蒙古族和其它许多民族，最先使用此称的似乎是鲜卑（道弗尔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对于这个问题作了很有根据的论述）。既然 qaɣan 作为君主头衔到处都用，是一个典型的、传播很广的词，说鲜卑语是一种蒙古语就得犹豫。为什么不能是突厥语呢？为什么不能是柔然语呢？为什么不能是别的中亚语言呢？

“处”字在上引《宋书》中解作第二人称代词“尔”。据高本汉的《中国文》（第85字）“处”在古汉语发音为 t'jo，在中古汉语发音为 ts'iwo，二合元音的重音在尾音 -o 上，-i- 只有 j 化的性质。伯希和认为此词与蒙古语 či（你——*'ti）相当，道尔弗所著《满语数词》（Der Numerus im Mandschu，1963年）在873页则视为原始蒙古语 *'ti（原始突厥语 *'si）。但是这个用汉字“处”转写的词，其古元音乃是 -o 而非 -i-。把汉字“处”的读音 ch'u/ts'iwo/t'jo 比定为蒙古语的前形式 či 也很难令人信服。我们满可以说 ch'u（你）相当于藏语 kyod（你），因为这里至少还有元音是一致的。要证明鲜卑语是一种蒙古语，就不能依靠《宋书》所说的“处可寒”，因为“处可寒”与蒙古语并无令人满意的语音对应，它是一个许多民族都用的词。

更确切地说，柔然也用“处可汗”（此处‘可汗’当然是 qaɣan）作为君主的头衔。百衲本《北史》卷九十八提到吐贺真在445年登上部主宝座时，说他“号处可汗，魏言唯也”。“唯”的意思是“应可”、“敬应”、“应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北史》和《宋史》此处都是音译一个同样的头衔词。但是两书对其含义的解释却不一致。人们可能要问，柔然部主称号“处可汗”的“处”（中古汉语 ts'iwo）是否即古突厥碑铭中所见的称号 čor

（见门格斯著《通古斯与辽》第31页）。不过这从汉字得不到解释。也许阿尔泰学家可以说明，柔然部主这一称号（诚然是设想的原始蒙古语）是什么意思。如果要把《宋史》和《北史》所记述的称号归于同一个非汉语词源，倘若不是两书的解释都错，那只有一个解释可能是正确的。

（2）阿干、阿于　汉文的“干”字和“于”字因字形相近，在汉籍中往往相混。照伯希和的读法，正确的是阿干。然则百衲本《宋书》卷九十六（2a 5）用字却是“阿于”（训义为‘兄’）。如果读作“阿于”，据高本汉的《中国文》“于”字在古汉语读作giwo，在中古汉语读作jiu。匈奴单于的“于”字，据蒲立本（Bulleyblank）的读法又当为古汉语'hwāh〔见《大亚细亚》（Asia Major）1962年新刊第9期第256页〕。只有重拟出“于”字含有元音-a-，才能把鲜卑语的“阿于”同蒙古语的aqa（兄）对比，而且还要假定“阿干”是“阿于”之误。据道尔弗所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138—140页），aqa在《蒙古秘史》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兄长”，一个意思是“老人”和“长者”，而以后者更为普遍。甚至君主也称为aqa。但是以-n结尾的蒙古语形式却不曾有过，而“阿干”（如果要这样读的话）则见于托跋时代，甚至用作称号（如称‘内阿干’）。卜彼得（Boodberg）和巴津（Bazin）都曾指出过这一点，请分别参阅《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JAS）1936年第1期第171页和《通报》（TP）1950年第37期第311页。巴津认为“此词可能为前突厥语，亦可能为前蒙古语”。在我看来，aqa和aqan是互有连系的，我们知道，蒙古语的词尾-n很不稳定，可能也跟“可汗”一样，此词传入了中亚的语言，起初也许用以表示“老人”，后来在不同的语言中，则因地制宜产生了词义分化，于是蒙古语中才有aqa（兄）这个词，而在通古斯语中，正如门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也产生了一个与此相当的语词，甚至有的语言用来表示“叔伯”。这当然不是说，通古斯语是借自蒙古语。既然那个原词广泛传入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只能作出假定说：无论a-kan（阿干）或a-yü（阿于）都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语词，认为这个鲜卑语词具有蒙古语性质还是勉强可以的。

（3）莫贺　《宋书》卷九十六（3b,2）说“莫贺”的意思是“父”。据高本汉的《中国文》，此两字在中古汉语作muo-Yâ，与mo-ho完全相同。伯希和认为这是蒙古语的abaYa（伯叔），但是门格斯引证鄂尔浑河碑铭中所见的称号词baYa更与此相近。最近是道尔弗首先看出（见所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II，第369页）：这个称号词可能与baYatur（英雄、勇士）有连系。通古斯语的mafa和mapa（祖）则与此无关，因为汉文转写没有那个唇音。也许baqa原来也同aqa和aqan一样，是表示“老人”的意思，后来鲜卑人才借以专称“父亲”。直接把“莫贺”跟蒙古语连系在一起，那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充足理由，因为突厥语中就有这个词。

（4）纥真　“纥真”一词见于山名“纥真山”，此山在今山西大同以东。伯希和根据唐代（约813年）《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16b）的记载：“虏语纥真汉言三十里”，便认为“纥真”（据高本汉著《中国文》，此两字在古汉语读音为*g'wat-tiĕn，在中古汉语读音为Yuət—tsiĕn）是与蒙古语词Yučin（三十）有关联（见《通报》1929年第26期第251-252页所引《蒙古秘史》的Yučin）。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假设。但是有一件事情使得问题有一点复杂化：明代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四竟有山名“纥千”。据高本汉的《中国文》第365字，“千”的古汉语和中古汉语读音都是ts'ien，满可以说“纥真”与“纥千”相当。《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六十四“纥千”作“纥干”，大概“干”即出自“千”。然则《隋书》卷三十此山又作“纯真山”。是《隋书》说的.“纯真”为正？还是

“纯真”乃“纥真”之讹？我们知道，只要稍微精确一些来推敲汉文史籍提供的译名，就会很快发现事情是复杂的。毕竟《隋书》是早于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近二百年的著作。不过“纥真”与“纥干”是如此相近，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接受伯希和的看法。

但是这样能不能说鲜卑语具有蒙古语性质呢？“三十”的满语为gosin，女真语为ku-sen、gusen、gušin（见格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No 656）。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出自蒙古语的借词，因为满语和女真语的‘三十’，不能象说蒙古语 Yučin 出自 Yurban（三）那样采用通古斯语来解释（满语的“三”是ilan）。但是如果说蒙古语的“三十”可能早被历史上的某一通古斯语所借用，那也许是早在一千年以前，而蒙古语“三十”的前形式 Yučin 也可能被借入鲜卑语。伯希和一眼看出了它们之间的相近，却没有看出象“三十”这样的数词竟会是借词，这也是他稍有失察吧。

那末上述词汇材料那些是肯定可靠的蒙古语词呢？这些都是在语音对应方面不太令人满意的人称代词和流传很广的语词，或者是称号词，或者是数词。我们只认出一个数词“三十”是女真语（译者按：此与前文认为是借自蒙古语前形式之说有矛盾。），还认出一个头衔词（称号词）是见于突厥语或蒙古语。认为女真语属于通古斯语族是没有错误的，现在也还无懈可击。但是说鲜卑语与蒙古语相近，那便完全靠不住。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因为现有的语言材料还很不充分。对于契丹语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尽管现有的词汇材料较多，并不完全令人绝望。

2. 契丹部族名称

（1）奥衍　“奥衍”出自《辽史》，与女真族连称。门格斯曾经正确地指出，“奥衍”也与突厥连称。《辽史》卷八十九（1b）上还有“乌衍”与“隗衍”。《辽史》卷三十三（7b）谓“隗衍突厥”即“奥衍突厥”。此外还有“隗衍党项”之称。这说明所谓“奥衍”、“隗衍”、“乌衍”都是出自同一语言（契丹语？）的异译。其原形似为 *auyen、*uoyen 或 *weyen。“奥衍”既与女真、党项和突厥连称，必是一个表示族名的专用名词。门格斯正确地提问：“也许这是一个地名？”作为族名的专用词，首先可能就是：①数词（例如四卫拉特、九姓乌古斯等）；②方位词（例如准噶尔，出自蒙语“左手”）；③色彩词（例如哈喇契丹等）；④山水词（例如‘水××’、‘山××’等）。可见我们有很大的选择性，大到难于决定我们的取舍。我仅在此提请阿尔泰学家注意这一点。首先要指出的是，“乌延”、“兀颜”作为族名常见于《金史》，既然《辽史》的“奥衍”（‘隗衍’、‘乌衍’）与女真连称，那便是个通古斯语词。但是这需要另找根据。如果我们设想《辽史》所说的“奥衍”等是数词，自然就会想到“九”字在满语作 uyun，在女真语作 wu-yeh-wen（见格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第644字：*uye'en 或 *uyewen）、在古女真语作“乌也”（*uye 见《金史》卷一百三十五，10a）。还有一个要考虑的语词就是满语 eyen（水）在契丹语中的反映（例如‘水达达’、‘黑水达达’）。总之这必定是同一个词，被散居不同地区的民族如突厥、女真和党项等用来表示族称。不能说“奥衍”等是与蒙古语的 eye（和蔼）有连系，因为前者有个尾音-n。倒不如设想有关联的蒙古语词是 oyun（智慧），即《蒙古秘史》的 oyi(n)〔意即‘有理智的’、‘开明的’〕。不过这也不可靠。对于下文将要讨论的部族名称，情况也是这样。

（2）迭鲁敌烈　门格斯认为这个名称与蒙古部族 Tätäjit 有关，他设想“迭鲁”与蒙古语 delgegu（展开）有连系。这在语音对应上并不完全合适。正如下文所说，这个名称

的情况要比上节所述“奥衍”“乌衍”、“隗衍”复杂得多。由于汉字“鲁”和“烈”可能各有两个音值(l-或r-)，要进行语音重拟就得考虑'Delu/Delü/Deru/Derü 'Dile/Dire。唯一最保险的是，把它看作两个语词。因为有所谓八敌烈部，迭鲁敌烈只是其中的一部，其余的敌烈部则有北敌烈和八石烈敌烈（见《辽史》卷三十三，9b），还有乌古敌烈（见《辽史》卷十五5b-6a）。八石烈的“八”字当是数词，大概不是族名的一部分（详见卫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代》，97—98页）。即使“八石烈”是一个整词，那也可同满语和女真语对比。-le在女真语和满语中都是后缀，因此可将“八石烈”（Basile）比定为满语表示“西”的wasi-（请比较wasihôn，此处-hôn乃后缀）。女真语的fujile(下)〔见格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第595字〕更清楚表明-le是后缀。关于蒙古语和女真——满语表示方位方向的用词，伯希和已在《亚洲杂志》（JA）1925年第206期详述（第230—234页）。如果以“八”为表意字，那就需要解释“石烈”，这个词是不是相当于蒙古语的sira（黄）和契丹语的'šire呢？倘若是的话，所谓“八石烈敌烈”便是“八黄敌烈”的意思。但是因为“石烈”是一个契丹称号词，所以“八石烈敌烈”应当理解为“八个在石烈下面的敌烈”或者“在八个石烈下面的敌烈”。

然则《辽史》也用“敌烈”作为修饰词，这便使问题更加复杂。据卫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代》第521页，辽有皮室军八，其一即敌烈部皮室（《辽史》卷29，4b.9称“敌烈部皮室叛”）。《辽史》卷四十六（13a.6）、卷七十六(6b.4)和卷一百〇一(3a.1)都提到还有所谓敌烈军。我们感兴趣的也许还有契丹称呼诸军的名目。除了上述敌烈部皮室以外，还有所谓北皮室、南皮室、左皮室、右皮室、大帐皮室、徒鲁古皮室。由此可见，用作称号的有“左”、“右”之类方位词，有“南”、“北”之类方向词，有“大帐”之类表示居住方式的名称词，还有“敌烈”之类表示部族的名称词。那末“徒鲁古军”（见《辽史》卷九十五，2b.4）是什么呢？《辽史》卷四十六（28b.1）谓“徒覩见古国王府亦曰徒鲁古”，此“徒覩古”又见于《辽史》卷四（8b.1）。《辽史》卷一百一十六说“徒覩古”是“边徼外小国”（见语解8a，8）我认为“徒鲁古”和“徒覩古”几乎可以肯定是“突厥”，汉字转写的-t-音就是齿音-r-。既有所谓“敌烈军”，有“突厥军”也不是不可能的。

下面再进一步讨论“敌烈”的语音。这个名称必有齿音作尾辅音。汉文转写不录尾辅音，这是很常见的现象。《辽史》卷四十六（27a.2）明确指出“迪烈德国王府亦曰敌烈，亦曰迭烈德”。《辽史》卷十五（8b-9b）又称“迪烈得”。所有这些都是同一名称'Dilet或'Delet（'Diret或'Deret）的异译。金代也有这个名称，写作“迪烈底”（见《金史》卷七十二，17b.4）。此外金人还用此Ti-lieh作为专名（见《金史》卷七十二，17b.4）。辽金时代常用的名称“迭剌”，至少在金代就等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敌烈”（参阅《金史》卷二十四，16b.10）。但是也不能排除这就是拉施特所提到的塔塔儿族Nereit，据贝烈津的读法，拉施特此处所用波斯原文为Nereit，伯希和在《圣武亲征录译注》（第3页和第9页）则读作Tarat或Tärat，这是一个还不能作出结论的问题，也可以设想那是《辽史》卷三十（4b.10和6b.2）所说的“覩剌”。如果把我们刚才讨论的形式、尤其是'Deret（或'Därät）考虑在内，这个假设就可以肯定。若所论不谬，我们就得把那个常见于《辽史》的“敌烈”看作塔塔儿族的Tarat（尽管走的道路要弯曲一些），这也是同门格斯所立的假设一致的（不过他也把‘敌烈’解作‘种田’）。

至于“迭鲁”的含义，现在也还不明白。正如前文所说，这是族名“敌烈”（Tärät）

的修饰语。是方位词呢？还是色彩词呢？还是别的什么词呢？如果塔塔儿人是操蒙古语，如果“敌烈”是塔塔儿的一支，那“迭鲁”就可能是蒙古语词。又假设古代蒙古语的 die—可能转为蒙古语的ye-（这要请阿尔泰学家来决定），那这个蒙古语词或许就是yerü（一般的、平常的）。这样一来，所谓“迭鲁敌烈”就是“普通 Tärät/Täräyit”的意思。不过这只是设想，因为“迭鲁”在《辽史》仅此一见，无从进行对比以明其意义。

（3）婆离　门格斯认为“婆离”就是《世界境域志》（Hudud-al 'Alam）所记述的 Fūrī，这个看法是否正确，我不能判断。不过门格斯还指出，金代转写这个名称的第一个字含有元音 -a-。若仅以此为据，则需视其通古斯语源为 fu、pu-。把这个语词看作部族名称，可能是不妥当的，因为缺乏具体的依据，随便如何设想都是可能的。若依汉字转写，这个族名的原始形式也许是 *puli 或 *pari。如果从东部满语中去找词源，可能找到一个含义为“雪撬”（用狗和驯鹿牵引）的语词与此相当，这个语词就是明代所谓的“扒犁”或“扒里”，也就是吉列迷（Giljak）人的称呼，亦即满语的 fara（牛拉的爬犁）。对于这个问题，和田清波在 MTB（1933 年第 10 期第 67--70 页）和道尔弗在《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Ⅱ、41页）中都曾有所论述。一个部族是否可能以“雪撬”为名，那是很成问题的，尽管 Fara“婆离”在语音上十分相近。或许更有可能是采用“雪撬人”之类的名称来称呼某一事物，对于探讨部族名称的语源来说，这在原则上也是可能的。

（4）蒲卢毛朵　门格斯认为，“蒲卢毛朵”是居住在吉林省东部的某一部族的名称。这个名称用作造船工人的修饰语曾有一见，人们便设想可能与“船”有联系。在我看来，这是大有可疑的。如果仅从语音构成出发，还可以设想“蒲卢”相当于满语 furu＜*puru（暴戾）。至于“毛朵”是否如伯希和设想等于满语 modun（木头），那完全不肯定。如果考虑“毛朵”源出于蒙古语，很可能那就是蒙古语的 maYu（坏、丑、臭）附加复数词尾 -t 或形容词后缀 -tu。不过，一个部族名称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两个意义相同的语词构成，我还不曾见过，门格斯说“毛朵”出自汉语“木”（mo＜*moY、*mog）肯定也是不妥当的。倒是他在文章的另一处说得正确：汉字“木”的语音是 mu＜muk（又见高本汉的《中国文》第 1212 字）。

还有一个可能是：“蒲卢毛朵”表示地名。《金史》卷六十七（9a，9）提到穆宗（金太祖阿骨打之父）时代在“蒲芦奚水”有过一场战事。此“蒲芦奚”（水）与“蒲芦奚”（木）是否有关系？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门格斯说“蒲卢毛朵”是通古斯族，伯希和说它属于女真部族联盟，《辽史》卷六十九（14a，4）亦称“女真部蒲卢毛朵”（译者按：《辽史》原文为‘女直部蒲卢朵部……’）。关于“蒲卢毛朵”的问题详见池内宏在《满鲜史研究》卷中第 421—424 页发表的专论。

（5）乌古、于骨里、娅厥律　“乌古”在《辽史》被视为外族。门格斯正确地指出此名与“于骨里”、“娅厥律”有联系。卫特夫——冯家昇所著《中国社会史·辽代》（第 92 页）亦曾一一列举。门格斯还依据汉文史籍《契丹国志》卷二十五（第 176—177 页）说“娅厥律”人长发；或许就是“前亚高加索种，甚至是源于斯基泰”。我对此无力作出判断。不过我看似乎与突厥族有关。因为《契丹国志》（第 177 页）说“娅厥律”住在黠戛斯以西、单于突厥以北，这就完全相合。所谓单于乃是回纥所用古称号，详见卫特夫——冯家昇著《中国社会史·辽代》第 102——103 页。

乌古——于骨里也许还是柔然部主的姓氏“郁久闾”（古音似为 *yuguliwo）。沙畹在《亚洲杂志》（JA）1897年第 1 期（第 406 页）和福兰阁（O.Franke）在《中华帝国史》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1903年，第三卷，第284—285页）均有所论述。因此，所谓“乌古”、“于骨里”也可能就是柔然的遗种。箭内亘认为此名与翁吉剌特（Onggirat）有关，这是完全不对的，汉字“乌古”、“于骨里”根本没有含-ng-的字音。门格斯认为那是Ongkor——索伦族——也同样不对。正确的办法是拟出其原型。各种汉字转写都可归结为 *ugut、*yügür 等等。《契丹国志》卷二十二提到的“于厥”（此处尾音节未译出）也是这样，“于厥”指的是居于蒙古以北的一个部族，其生活方式与蒙古相同。

“乌古”之称亦见于金代。《金史》卷九十四（1b.6）有所谓“乌古十垒”，卷七（11a，4）和卷四十九（3a、2）又作“乌古里石垒”。后者含有音节-li(-r)而前者则无。此所谓“乌古（里）亦相当于*ugur。此外《金史》卷七十一（8b，8）还有“乌古敌烈”（*ugur Täräit？）之称。《金史》所谓“石垒”（‘十垒’）究竟是何意义，暂且还不清楚。也很可能“石垒”（‘十垒’）相当于《辽史》常用的“石烈”。不过我们所见的文献，表明直到12—13世纪还有一个柔然部主的姓氏存在于中亚。

（6）别古　门格斯认为，“别古”就是部族名称“麻达里别古”的“别古”，还说它的复数形式是begüt。我不知道是否有过这种形式。我不是阿尔泰学家，不过在我看来，其复数当为begler。但是重拟其形式为-t（或-r）是正确的，因为这有《金史》为证。《金史》除称“别古”以外（卷二，7b，2；13b，6；卷一百二十一3a，8又作水名），还多次提到“蠓故德”（见《金史》卷一，14a，3；卷四十四，2b，3；卷六十七，13b，4）。乍看似乎应当重拟为*Begut。但是结尾的齿音也用于表示结尾的-r。《契丹国志》卷二十二（第162页）便写作“蠓故里”，这表明那个-r是一定有的。《契丹国志》还说，“蠓故里”位于“娅厥”（见前）和蒙古的西北。这里汉文转写的“里”字当是尾音-r。由此可见，“别古”的原型不是*Begut，而是*Begur。

（7）女真　对于门格斯的文章所谈到的女真这个族名及其形式，当年伯希和作过最全面的研究，见《马可波罗游记注释》(Notes on Marco Rolo)第一卷第366—390页。我就不在这里多谈。不过要指出一点，门格斯所引邦格（Bang）的看法，伯希和是反对的。还有一篇讨论女真的著作需要在此一提，那就是李学智的论文《释女真》(见《宋史研究集》，1966年，台北，第三卷，第351—384页）。李学智所依据的史料，一部分与伯希和相同。他对“女真”之称的由来，提出了十分大胆的、不无证明的假设。这篇文章的价值就在于，作者所做的史料考证比伯希和更多。有趣的是李学智的结论：他认为“女真”乃是“如者”的转讹。“如者”是“室韦”部族联盟的成员。拉齐涅夫斯基在《室韦是蒙古族吗？》一文中，就曾注意到所谓“大如者”、“小如者”。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16b，4和8）“如者室韦”曾于公元748年入贡中国。如果“如者”真是后来的“女真”，那就是说这个族名可以上溯到八世纪。伯希和也曾设想“女真”即唐代“如者”（见《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386页）。不过这个说法有个弱点，就是“女真”（Jurčen）含有-r-，而“如者”却无此音，要讨论李学智的假说是否可以成立，那还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

3. 称号和人名

（1）乙不哥　“乙不哥”是“耶律乙不哥”的名字。门格斯引证卫特夫——冯家昇的著作，说他“幼好学，长于卜筮，不乐仕进”，因此作出结论说“乙不哥”之称与“预卜”有关。但是为什么不会同乙不哥好学有关呢？单从这个事实就足可以看出，说“乙不哥”之称与“预卜”有联系是完全靠不住的。那不过是种种可能的解释当中的一种而已。门

格斯还说“乙不哥”相当于蒙古语 jilvi、jilbi，这在语音上也同“乙不哥”不甚相合。如果要确定“乙不哥”之称的来源，倒是蒙古语的 ebüge（祖先、先人）〔见《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第110—111页〕或 ebügen（老头）〔见同书第109—110页〕更相宜。“祖先”（ebüge）一词在《华夷译语》记作 ê-pu-kê〔见烈维兹基（Lewicki）No. 16〕，就跟“乙不哥”很相近。“乙不哥”的“乙”字读 iẹ，完全有可能在蒙语中为 e-。

（2）林牙　门格斯认为“林牙”相当于突厥语 alymYa。但是伯希和则认为，“牙”是汉语“衙门”的 ya-，“林”是“翰林”的“林”（见《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一卷第221页）。可见这个官衔完全是汉语而非契丹语。

三、其它语词

（1）拽剌　门格斯引证《辽史》称“走卒谓之拽剌”，说它与突厥语 yadaY 有联系。这在语音对应方面是不太令人满意的。而且问题更复杂的是，“拽”可以读作 yeh，也可以读作 chuai 或 shih（见《中华大字典》第850页，《大汉和字典》第五卷，218 IV）。若依后一种读法，这便需要考虑古读首音为 ś-。如果把“拽”字今音 chuai 还原为古音，并且从通古斯语找对应，那也许就相当于满语的 jalan（甲喇、队）。若此说不误，就可进一步明了《辽史》所谓“拽剌”（chuai-la）常常用作官衔的一部分。满语 jalan 在女真语作“察那安”（cha-la-an＜jalan，见格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第848字）。“拽剌”没有把尾音 n 反映出来，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例如“九”字满语为 uyun，在古女真语作“乌也”，在后期女真语作“乌也温”。

（2）耨斡麽　《辽史》卷一百一十六（22b）谓此乃皇后尊称，（译者按：《辽史》语解“耨斡麽”条原文为“麽”亦作改。斡翰，后土称；麽，母称。正如门格斯所云，系由“后土”（土地神）加蒙古语的“母”所组成。但是门格斯视其为通古斯语，并且拟构其形式为 *na-ba-eme（地母）。在这语音上是完全不合的。因为“斡”字音 -wo-，亦见于“斡鲁朵”（ordo）之称。我们不能把“斡鲁朵”读作 bordo 或 bardo，所以说代之以 b- 是毫无根据的。

最好还是把《辽史》涉及“耨斡麽”的那段文字仔细研究一下。据《辽史》卷七十一“后妃传”：“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国语谓之忒俚蹇，尊称曰耨斡麽，盖以配后土而母之云”。

首先我们来研究所谓“忒俚蹇”。《辽史》语解又作“忒里蹇”，谓是“辽皇后之称”。卫特夫——冯家昇释为蒙古语 terigün（首，第一）——见《中国社会史·辽代》第431页。不过我不相信“忒里蹇”（10—11世纪古读似为t'e'-li-k'ien）会与蒙古语的 terigün（中古蒙古语已变成 teri'un 了）有联系。可能“忒”字在唐代还有尾音 -k，至少在10—11世纪的时候还是入声字，因此读音近似 t'e'。所以“忒里蹇”的读法可能为 te(g)riken 或 te(g)liken。我看这就与回鹘称号 tängrikan 很相近。后者的意义在突厥语是“神灵的”，多见于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献，例如拉德洛夫（Радлов）的《回鹘铭文》（Uigurische Sprachdenkmaler，1928年）第38—39和57—59页所收回鹘碑铭便是这样。铭文称呼回鹘君主为 Iduq Qut Täng rikän〔见《文献》（Dokument）No.40、41〕。Täng rikän 见于上述回鹘碑铭（第38—39页）第一行，又数见于第五行，此处还用于称呼妇人（后妃）。除了道尔弗所举的例子以外（见《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Ⅱ，第578页），

柏林所藏吐鲁番文献一蒙古文断简也有 Tängrikän 这个词，那是我在一次访问柏林的时候发现的，准备在匈牙利科学院为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家大会（大会地点为乌兰巴托）编辑的文集中发表（上述蒙古断简的代号是 TM 102c）。由此可见，Tängrikän 乃是回鹘用以称呼君主及其后妃的称号，而汉文转写的“忒里蹇”则用以称呼辽国皇后。我看这在事实和语音方面都是很清楚的。

但是，所谓尊称“耨斡麽”的问题却要困难得多。《辽史》语解（卷一百一十六，22b，8—9）说“麽亦作改；耨斡，后土称；麽，母称”。

《辽史》原文既然这样说，那只能解释为“耨斡麽”与“耨斡改”是并用的。至少根据汉文文献是有这种可能。现在我们首先来研究“耨斡”是什么意思。“耨斡”古音作 nęu-ue、nęu'o。怎么着手来研究呢？且让我们先来看看通古斯语。满语 non 是“妹子”的意思，女真语作“捏浑温”（*nehūn）——见格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第 291 字。前文已经说过，尾音 -n 是不稳定的，因此可以设想，“耨斡”乃是契丹表示“妹子”的用词，与满语和女真语相当。汉文史料并未说“耨斡”即“后土”，但说“盖以配后土而母之”。这等于说“耨斡麽”不是皇后的意思，而是皇后的称号。我不知道别的语言是否也象通古斯语那样用“妹子”来称呼想象中的土地女神（也许这样称呼是出于禁忌），这个假设只好提请通古斯学家去讨论。

考虑到契丹语是一种古代的南蒙古语，更适合的是从中古蒙古语来探述可能的语源。这便有两种可能。《蒙古秘史》第 220 节有个语词 no'u 汉文作“隅”，如果《辽史》语解说“耨斡，后土称”是正确的，则“耨斡”与 no'u（隅）在语音上完全相合，但在词义上却有不同。这也许是因为《蒙古秘史》那个语词 no'u 原来具有更一般的意义，与“土”的概念接近。另一种可能就是：“耨斡”与蒙古语 niγun、nuγun(儿、孩)——《蒙古秘史》第 65 节作no'un，汉文转译为“讷温”——有关联。波普（Poppe）说达呼尔语还有一个语词 nōn是“儿、孩”的意思〔见《德国东方学会杂志》（ZDMG）1948 年第 99 期第 278 页〕。这与《辽史》所记述的“耨斡”在语音上也很相合，但在词义上仍有疑难。土地神（后土）是用“儿、孩”表示吗？如果是的话，那“耨斡麽”指的就是“儿子的母亲”、尤其是指“神的儿子之母”。

现在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前文所说的“耨斡改”（*nou'ogai）。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自然立刻就会想到蒙古语 natigai（见《马可波罗游记》）、ytoga(见《柏朗嘉宾行纪》)和 Načirai（这是田清波发现的、见于早期 13 世纪的蒙古语）。蒙文佛经《入菩提行》Bodhi-caryā-vatara）注释（搠思吉斡节儿注）便用 NačiγAi eke 表示“地母”，见田清波著《马可波罗游记中的蒙古词 natigay/nacigay》〔Le mot natigay/nacigay chez Marco polo，载于 1957 年的《马可波罗所见的东方》（oriente Poliano）第 95—101 页〕，还可参阅柯立甫在 1954 年《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JAS）第 17 期第 124 页发表的论著，以及伯希和在《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中的论述（见卷二，第 791—792 页）。至少这便可将《辽史》记述的“耨斡麽”或“耨斡改”看作蒙古母语的 naciγai eke。是否还有可能另作别的解释，那就完全说不定。1969 年 6 月我接到道尔弗的来信说，蒙古语的 -ači- 在某一通古斯语中仍作 -ači-，遗憾的是未见-č-脱落的现象。不过说契丹语的“耨斡改”相当于蒙古语的 naciγai，的确是很有吸引力的，虽则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更为遗憾的是，“地母”在蒙古语里还另有一个形式etügen eke（ötegen eke），这在语音上与契丹语词不合，尽管显然指的是同一回事（译者按：《元朝秘史》第 113 节作额客额秃格（eke etügen），第255节作斡脱坚

额客 ötegen eke。前者旁译‘母地’，后者旁译‘地母’，似无‘后土’含义。此额客可能即 yeke，乃地大之谓）。

（3）掠胡奥　门格斯的文章是把“掠胡奥”分割开来加以研究的。据汉文史料《燕北录》（第16b—17a）：虏语“掠胡奥”即“赤娘子”（又见卫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代》第274页）。石泰安早就指出这是“赤老妪”的意思（见1940年《通报》第35期第73—74页）。与门格斯的看法相反，《燕北录》原文指出的不是契丹所谓的“奥姑”（见《辽史》语解），而是传说的契丹皇祖。这位先祖名叫“掠胡奥”，汉译“赤娘子”。门格斯设想“掠胡”必与阿尔泰语表示“红”的语词相当，并且说这就是蒙古语的 ulaYan、满语的 fulgiyan 等等。这真是不顾第一个字随便乱猜。重拟这个契丹语词的原型是不必引证中古汉音的，因为《燕北录》成书较晚（1058年）。还必须指出，我们研究的是“掠胡奥”，尽管“奥”字也许与契丹拜奥礼所谓的“奥姑”有关。这个“奥”字当然是借自汉语，因此“掠胡奥”中的“掠胡”是异族语词，“奥”是汉语语词。当然，“奥”是异族语词也很有可能，或者是表示后缀，或者是表示某种人的称呼。不过我还不能说明“奥”的含义。

但是一定要说“掠胡”是“红”的意思，则不无可疑。“赤”固然有“红”的含义，也有“肉色的、赤裸的”的含义。汉学家最先考虑的也许就是后一种含义。满语 niohušun 就是“光身”的意思（据道尔弗函告，此词蒙古语作 ničügün，《蒙古秘史》作 nicühun）。大概 niohušun 中的 -šun 是后缀，niohu- 则是词干〔译者按：满洲语 niohušulembi（光身）当与niohun（豆绿）有联系〕。n-转换为 l- 在语音上便与“掠胡”（lüeh-hu）极其相近。实际上还可援引《燕北录》原文来支持这种解释。据《燕北录》（第16b-17a）：“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一妇人，因生其族类，其形木雕彩装，常时于木叶山神庙内安置。此言“黄河中流下”自然是赤身露体。《燕北录》上“黄河中流下”几个字是写得清楚明白的〔译者按：‘黄河中流下’意即‘顺黄河而下’，非是一身不挂在黄河中流〕。还有另一种族源说也谈到“沿黄河而下”，详见卫特夫——冯家昇所著《中国社会史·辽代》一书第272页所引《辽史》文〔译者按：《辽史》地理志一永州条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黄河而下……’〕。我认为我的解释至少也同设想“掠胡”为“红”的尝试一样有根据，只有找到阿尔泰语表示“红”的语词切合“掠胡”的“掠”音，那种设想才可能成立。

伯希和（见1925年《亚洲杂志》第206期第262—263页）和李盖第（见1960年《匈牙利东方学报》第十卷第3期第237页）都曾指出，通古斯语表示“红”的语词在古代女真语是以p-为首音。证据就是《金史》卷一百三十五（11a，3）所记述的“蒲剌都”，意即“目赤而盲也”。“蒲剌都”用作专名亦曾数见（《金史》卷七十三，17a；卷八十五，5a、b；卷一百二十四，8a）。这个词的首音系列当为 p-（古代女真语）、f-（后期女真语）和 f-（满语）。伯希和还指出另有一词为古代女真语“蒲阳温”，意即“幼子”（见《金史》卷六十八，2b、9；卷一百三十五，10a，6），其拟音为 *puyanggun，相当于满洲语 fiyanggô。

门格斯根据格鲁贝引《金史》卷一百三十五（12a，5）所记述的古代女真语“活腊耶”（huo-la-hu，其拟音为 *qulaqu 或 *qolaqu）认为与满语 fulgiyan（红、赤）很相近。但是还有一个蒙古借词 gula（黄马）也同样十分切合（此词见于《蒙古秘史》第147节）。-qu 也许是女真语的形容词后缀，就象 an-ch'u-hu（金）中的-hu一样。详见下文关于“女古”一词的讨论。

（4）赤实得本　“赤实得本”是契丹斡耳朵的名称之一，《辽史》解其义为“孝”。门格斯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要看看“孝”这个对汉人很重要的概念在阿尔泰诸语言中如何翻译。清代字书《五体清文鉴》第1419页把“孝”字译作hyošun（汉语‘孝顺’），但是真正的满语是senggime，后期女真语则为seh-keng-kê（塞更革，拟音为*segengge，见格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第408字）。在古代女真语中，至今还没有找到这个词。蒙古语则把“孝”译作elberil（见《五体清文鉴》第1419页），同时还有一个当“孝敬”讲的动词takimda-。14世纪（？）的蒙译《孝经》把“孝”译作ačilal，《孝经》即被译为ačilaltu nom。有趣的是《五体清文鉴》所列维吾尔语乃是阿拉伯借词‘Azīz（孝）。

契丹语“赤实得本”的拟音大概是*čiš(i)da'bun，不过在别的语言找不到与此对应的语词。门格斯企图比定为满语的cikta（生长、长大）〔译者按：满语表示生长意义的词有cikjalahabi(发芽)、ciksika(长大)、ciktaraka(滋蔓)、ciksikabi(长足)、ciksimbi（长定）、ciksin(壮年)；ciktan的意义是‘伦常、伦理’〕。看来不排除有此可能。但是《辽史》还有一条材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那就是《辽史》语解又说“得失得本孝也”。也许这两个不同的词的形式代表同一个语词，也许其中有一个形式是错的。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两个形式：一个首音为齿音，一个首音为上腭音。前一形式可能拟作*dc'šide'ben，但是这个词显然也同阿尔泰语没有连系。也许可以设想为满语dekji-（成长、长进、兴旺），但是必须弄清楚：“得本”在这两个词中是否具有“听话”的含义。-bun在满语乃是动词构成名词所用的后缀。仅此一端便足可使人想到上述两个形式的意义。大概与此有关的语词是满语的tebu-（令坐、令放、使坐、令住），其动词词干为te-（坐、存、住、做、登基？）。这样*tebun/de'bun便可能具有“住处、居处”的意义。不过这是一种很难证明的设想，是以通古斯语根为依据的。在蒙古语中就找不到这样的词。

（5）耶鲁盌　“耶鲁盌”也是契丹斡耳朵的名称之一。《辽史》语解和营卫志释其意义为“兴旺”。与此意义相同的契丹语词还有“蒲速盌”（亦见《辽史》语解和营卫志），门格斯的文章亦曾讨论。遗憾的是汉语“兴旺”含义太多，不能为这两个契丹语词从多方面去找词源。大概“耶鲁盌”与“蒲速盌”的所指是相同的。门格斯倾向于认为“耶鲁盌”是通古斯语、“蒲速盌”是蒙古语，这也不无可能性，不过因为这两个语词词尾相同，也还需要我们花费时间去弄清它们是否属于同一种语言。

与“耶鲁盌”语音十分相近的是“阿鲁盌”。《辽史》营卫志释为“辅佑”。《辽史》语解书作“何鲁盌”。“阿”与“何”是否有讹错？哪个形式是正确的？这也很难判断。我们就只好相信《辽史》语解的写法。而且我认为“耶鲁盌”同“阿鲁盌”（或“何鲁盌”）是同一个契丹语词。汉文释义所谓“辅佑”或“兴旺”，可能是就其最一般的词义而言，并非指其具体含义。感谢道尔弗告诉我说，舒尔曼（Schurmann）曾经提出一种假设，认为“阿鲁盌”可能与蒙古语alban(贡赋)有关。详见1956年《哈佛亚洲研究杂志》(HJAS)第19期第377页。

（6）斡突盌　“斡突盌”也是契丹斡鲁朵的名称，门格斯引作“窝笃盌”。对于门格斯的巧思，我不能置赞一词，在我看来，视其首音为b-则是相当任意的。同是一个汉音wo，在ordo中代表的是o-。倒是卫特夫——冯家昇著《中国社会史·辽代》第545页注54所设想的ote-、ete-在语音上更有根据。《辽史》语解把“窝笃怨”释为“蕃息”，实为“孳息”之讹。《辽史》亦有“斡突盌乌古”之称（见卷三十三，8a，4；卷四十六，5a，3；卷一百〇三，4b，1），即用作前述“乌古”的修饰语。其拟音当为*otuwan或

*oduwan，我看这两种形式都有可能。第一音节的元音肯定会是 -o-。不过我还没有把握解释这个词，只能提出一些设想来供大家讨论。且先从汉文释义说起。

《金史》也有一个女真语词与《辽史》记述的契丹语词意义全同。《金史》卷四十四（14a，4）释“乌鲁古”为“孳息”。我看这个女真语词可能与满语 ulha（牲口）有关。“乌古鲁”的拟音当为 *ulgu 或 ulugu。我们之所以拟作 -l- 而非 -r-（这当然也是可能的），乃是出于考虑此词与满语 ulha 有联系。这还可引下述史料为证。《金史》卷五十七（22a.8）有所谓“乌鲁古使”，汉文释作“群牧使”，《金史》一百三十五（10a，2）亦释为“牧圉之官”。既然金代表示“孳息”与“牲口”使用同一个词（满语为 ulha，古代女真语为‘乌鲁古’），那对契丹语词“斡突盌”也可作同样解释：此词既有“孳息”的含义，也有“牲口”的含义。这样一来，所谓“斡突盌乌古”就是“从事畜牧的乌古”，“斡突盌”（*oduwan）也许就是蒙古语的 aduɣun（牲口、马匹）。既然契丹是操使一种古代南蒙语，当然古代南蒙语的 *oduwan 是与蒙语 aduɣun 相当的。阿尔泰学家也熟知 aduɣun 这个词，要请他们研究一下是否适宜把 *oduwan 同突厥语 ud（牛）联系在一起，如果不能比定为蒙语 aduɣun 的话。

（7）监母　“监母”也是辽代斡鲁朵的名称。门格斯根据汉文释义为“遗留”，就说它与通古斯语的词根 ga-（取）有关。但是汉文“遗留”的意思是“取”的反面。“监母”的拟音当为 *gemmu（‘监’字古音收 -m）。这个词的发音不太象蒙语，也许是与满语 gemun（京都）或 kemun（准则、准、制子）有关——如果考虑到尾音 -n 不稳定的话。不过这样比附在语义上说不通。

（8）怦里　门格斯引《辽史》释“怦里”为“请”。《契丹国志》卷二十七（第183—186页）亦有一词“辖里”与此语音相近。汉字“怦”和“辖”的首音相似（中古汉音 ga- 或 ɣa-），故可拟音为 *gali/gari 或 *ɣali/ɣari。“请”在满语为 soli-、solimbi（见卫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代》第624页），在蒙语为 jala-。石泰安就曾设想 jala- 可能与“怦里”有关（见1940年《通报》第35期第126页）。但是这样对比在语音上仍不令人满意。因为汉文“请”在后期女真语作“退本”（见格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第441字），格鲁贝认为此词与满语 tuibu-（请、祈）有关。对于“怦里”的词源，现在还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完满的解释。也许白鸟库吉早先提出的解释是正确的。他认为“怦里”与共同通古斯语词根 gele-（请求、要求）有关联〔译者按：满语 gelemibi、gelesu、gelecuke 等均含‘惧怕’的意思，只有 Geju-（需索、苛取）勉强可说与‘请求’有关〕。门格斯反对此说，而认为“怦”字收音有 -p。这种看法也不正确，因为根据高本汉的《中国文》（第314字‘怦’的收音当为-t）。上述两说也许都不可取，最好是把“怦”字的收音略而不顾，而视其读音为 χa、ɣa 或 ga。

（9）女古　“女古”也是斡鲁朵的名称之一，《辽史》语解和营卫志均释为“金”。门格斯认为，此词可与蒙语 noɣuɣan（绿）或满语 niowanggiyan（绿）对比。从语义方面来说，这完全不明显。为什么“金子”用“绿色”（而不用‘黄色’）来表示？李盖第在《匈牙利语》（Magyar nyelv）发表的文章就说“女古”的语源不可能是这样，伯希和在《马可波罗遊记注释》第一卷（第380页）也未能解释此词。通古斯语和蒙古语表示“黄色”的语词在语音上也不合适（满语作suwayan，女真语作*sogian，蒙古语作šira），何况都不是象altun（突厥语）、altan（蒙古语）、“安春温”（见格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第568字）：an-ch'un（古代女真语，见《金史》卷一百三十五，12a，2，其拟音为 *alčun）、

aisin（满语）等等那样表示“金”的专用词。除了上列女真语词以外，《三朝北盟汇编》卷一（1939年版）还有一个女真语词是“阿禄阻”，这也是一个齿音化了的女真词，其拟音为*alzu。

综上所述，可见我们所研究的“女古”或者是某种尚不为人所知的语言表示“金”的用词，或者是一个原始的阿尔泰语词，不过在各种阿尔泰语中，这个词已经死亡，或已被altun等词取而代之了。还有第三个可能是汉文释义有误：“女古”根本不是“金”的意思。正如下文所述，汉文史料的记述是相当混乱的（译者按：‘女古’释义为‘金’亦见于《焚椒录》）。

首先，“女古”亦曾用作河名。《契丹国志》第1页有所谓“女古没里”（金水），“没里”即*muri，相当于蒙语müren（江河）。这条河是否即《金史》卷二十四（16，9）所说上京附近的“按出虎水”？《金史》释“按出虎”谓“国语曰金”，其拟音当为*alcuqu，可能就是女真语*alcun(金)的形容词形式。这个名词亦见于《辽史》（卷三十七，2b.5），其形式为“按出”（*alču）。卫特夫——冯家昇的《中国社会史·辽代》第272页谓此河即今西拉木伦河。既然“女古没里”很可能是“按出（虎）河，也可能“金”字除了那个通古斯称呼之外还有另一个形式是“女古”。究竟“女古”是契丹语词还是象通古斯形式“按出”那样的非契丹语词，尚不能最后肯定。这条河的汉文名称则是“潢河”。

但是《契丹国志》说这条河名叫“袅罗箇没里”，其拟音即*niologo、*niolgo、*niorgo。“女古”和“袅罗箇”乃是同一河流的两种称呼，很可能就是同一地方语名称的两种译名。这便可以比定为满语niohon（豆绿）、nioro-（青）及与此有亲属关系的语词，它们的词根都是nio（绿、青），niowanggiyan（绿）一词即由此派生。可以设想“女”的中古汉音是nịwo，也许在10—11世纪就是这样。所以，把这同一地方语名称的两个形式“女古”和“袅罗箇”联系在一起，不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那条河名原义当为“兰河”或“绿河”，称“女古”为“金”则是后来因女真语称呼此河为“按出”〔*Alču(n)〕而附会所致。

当然还可以提出另一种解释，说“袅罗箇”是蒙古——通古斯语河名之讹，即将“袅罗箇”比定为*niyᵒrgo而与满语niyarhûn（新鲜的、清洁的）连系在一起。这样一来，那条河名原义就是“清河”，而与后文提到的“浊河”相对。

在进一步确定“女古”的含义之前，还有必要简略地研究一下另一个契丹河名——“老哈河”。“老哈河”原名“土河”（即‘浊河’）。《契丹国志》还提到两个地方语名称是“北乜里没里”和“陶猥思没里”。所谓“没里”当然就是蒙语müren（河）。成问题的是“北”字究竟是译意字还是译音字？因为汉语“土河”意思是“混浊的河”（与上述青绿色的‘西拉木伦河’相对），所以可从这一方面来探讨原语的含义。“北乜里”可以拟音为*beimer(i)、*beimel(i)、*bemel(i)、*bemer(i)，蒙古语bai（在）的派生词有baimal（静止的、不流的），详见列辛（Lessing）的字典第75页。汉语“土”在蒙语为široi，在满语为boihon。这两个语词都与上述两河名称的读音不合。“混水”、“浊水”在蒙语为bulanggir，在满语为duranggi，这与上述两河名称的读音也不相合。至於“陶猥思”（*taowis）是否蒙语toɣosu(n)〔尘土〕或dabusu(n)〔盐〕，那还纯属猜测。不过有人说，这条河的契丹名称是指“土河”特别混浊或多沙。例如有一本11世纪的旅行记就曾明确说到“土河”积沙成丘，详见沙畹的译文〔见《亚洲杂志》（JA）1897年，第439-440页〕。沙畹翻译的这部汉文著作还提到“土河”就是《隋书》所谓“讫纥臣水”（《唐书》作‘土护真水’）的简称。在我看来，这是很有道理的。这条河称“土河”乃是因为它与前

述“清河”相反，混浊而多沙。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女古”的含义。如前所述，“女古”也是一个斡鲁朵（ordo）的名称，亦用作头衔。例如《辽史》卷引称“女古斡鲁朵”、“女古蒲速盌”（六‘瓦里’之一），还有“女古斡鲁朵”属下的“石烈”称为“女古滂”。除了“北女古”之称以外，还有所谓“南女古”，即“监母斡鲁朵”的“石烈”之一。甚至“皮室军”亦有称“女古”者，例如《辽史》卷二十八、卷七十都提到所谓“女古皮室”。这里所谓的“女古”含义都与“金”无关。《辽史》卷二十一、四十六、六十九等还以“女古”为部族名称。就在金代这些部族名称仍存。例如《金史》卷七十六、卷六有“女固”，卷二十四又有所谓“迪烈女固”。

考虑到“女古”的含义为“金”、而女真建国又称“金”，人们自会设想其间必有连系。例如李学智在《宋史研究集》的“释女真”一文中，便是这样论证的。他认为‘女真’（女字古读又作 ju）的含义就是“金”。《辽史》解“女古”（而非‘女真’）为“金”也许是有意改字，这可以上溯到陈大任在金代撰写的《辽史》。尽管人们可以赞同李学智的说法，但是上述有关“女古”诸例表明，“女古”作为部族名称的意义在所有的例子中都是很明确的。“女古”之表示“金”是原始语义还是通过通古斯语“黄河”之名派生的意义，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

（10）戴辣　正如门格斯引卫特夫——冯家昇的著作所说，“戴辣”义为“烧甲”。但是也如门格斯所强调，这个契丹语词的解释不是没有问题的。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契丹国志》“烧甲”作“戴辩”（译者按：《契丹国志》在另一处又作“捏辩”。不过门格斯怀疑以“辣”为“甲”乃是后人所改。如果“甲”的真正译音字是“辣”而非“辩”，倒可比定为满语 leli。据《五体清文鉴》“军器门”，leli的意思是“护甲”。

四、其　它

对於门格斯所引契丹语言材料，还有一些需要在此略加讨论。

（1）炒伍俑　契丹语“炒伍俑”义为“战”，一作“炒离”（《契丹国志》），其拟音均为 'cau'ur 或 'caur。卫特夫——冯家昇视其为突厥语，但是更可能是蒙古语，例如《蒙古秘史》便有 ča'ur 这个词，其意义为“征进”。

（2）“胡都”、“乌”及其它契丹河名　《契丹国志》卷二十二谓“山”为“胡都”、“水”为“乌”。说“胡都”的意义是“山”，我还不能解释，这要请阿尔泰学家去研究。说“乌”的意义是“水”，我也不能解释。不过很可能的是，蒙古语的 usun（水）一词后缀 -sun，是表示集合体的意义，例如 qulu-sun（芦苇）、ele-sün（草）、šigü-sün（粮食）等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可以分离出一个蒙语词根 'u-（水）。不过这也要请阿尔泰学家来决定。

以上所说当然仅适用于我们接受《契丹国志》的说法。但是我还要指出一点，所谓“胡都”、“乌”都有疵病。这首先需要弄清《契丹国志》之所本。我们知道，《契丹国志》并非第一手资料，它所根据的是宋绶的行程录，此人曾在1020年访问过契丹。沙畹依据《文献通考》第三百四十六卷，已将其行记译成法语（见《亚洲杂志》，1897年）。这里原文说的是：由此再行七十里，即讷都乌馆；虏语谓“山”曰“讷”，谓“河”曰“乌”。这里要注意的是，汉文只用一个“讷”字，表示契丹“山”字的第二音节已被翻译者所省略。与此内容相当的还有《宋会要》的记载。此书卷一百九十六也用“讷都乌”三字，与沙畹所译《文

献通考》上的说法相同。如果这是正确的，就得把《契丹国志》所说的“胡都”改为“讷都”。《资治通鉴长编》也有关於宋绶出使契丹的记述。据1881年版《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七，“山”的读音是“奴图克”，“水”的读音是“乌苏”。这当然是出于乾隆的史臣所为，是他们“更改”了辽金元时代的非汉语名称和术语，甚至把他们改得面目全非了。所谓“奴图克”、“乌苏”，就是他们依据蒙古语所改。“奴图克”当然就是蒙语 nutug、“乌苏”当然就是蒙古语 usu(n)。因此，在以下的讨论中，这两个形式我们就不考虑。

首先我们注意到，原始史料有两种形式释“山”，即“讷都”和“胡都”。毫无疑问，这里有错字。据（诸桥）所编《大字典》，“讷”和“胡”的草书形式是很相近的，极易相混。我在下文将要说明，这两个形式都有错，很可能原始史料记述的是另外两个字。这里我且先来讨论那个表示“水”的“乌”字。

各种行纪的原文都说“乌”义为“水”。然则“乌”字最易于与“乌”混淆。还有一个读音为 niao 的字是“袅”，其意义为“软”。如果我们相信从《宋会要》、《文献通考》到《契丹国志》都有错字，那很可能“乌”字也错，实际上辽金称呼水名用的是——niao（袅）。

1044年的《武经总要》卷十六曾略述契丹军事地理，文中提到所谓“大盐泊”。据《辽史》卷三十七，此属“上京道”（又见卫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代》第151页）（译者按：《辽史》卷三十七但言上京道有‘盐泺’）。有人认为‘大盐泊’即察哈尔的达赖海（Dalai nor），本文且不讨论。“大盐泊”还有一个写法是以“泺”为“泊”，《辽史》卷四十一谓在来州境内。至今满洲也有所谓 Tabsu nor（蒙古语‘盐海’），可能就是辽代的“大盐泊”〔见施伯（Gibert）：《满洲史地字典》，1934年，第833页〕。金代也有“大盐泊”之称，《金史》卷四十九谓其在临潢之北（参阅伯希和：《圣武亲征录译注》第196—197页、402页、408页）。不管辽金时代所谓“大盐泊”是否即今 Tabsu nor（盐海），对于我们的问题来说，重要的是《武经总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地方语名称即“麋到斯袅”。这是否即汉文所译“大盐泊”的原始形式？“到斯”二字可以看出就是蒙古语dabusun（盐），后期女真语亦称“盐”为“答卜孙”（见格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第527字），满语则为 dabsun。其次，“麋”可能是异族语词，其含义为“大”。这便可以设想，“袅”的意思就是“水”。

《武经总要》卷十六还有一处提到所谓“大水泊”。辽代称“大水泊”者有两处，——距上京500里，——在松花江以东，其土名即“撒得袅”。这里又是以“袅”为“水”、“泊”。“撒得袅”是否即《辽史》卷十九所谓的“撒剌泺”，还不能解决，因为没有说明后者的方位所在。然则“袅”的含义为“泊”是无可怀疑的。我相信“袅”就相当于满语niyo，其意义为“水地”、“沼泽”，因此，这是一个通古斯语词，其首音为 n- 多见于满语和女真语，而很少见于蒙古语。“撒得”则必为 *niyo（袅）的修饰语，不过暂且还不能明瞭其意义，最好是从通古斯语来探求其词源。

前文已经说过，《契丹国志》所谓“讷都”和“乌”都有疵病。若说“袅”也可能是“乌”之误（因两者字形相近），这却还有无法推翻的反证：“袅”（niao<*niyo）在金代也还用作河名。例如《金史》卷二十四提到临潢即辽上京境内有河名“合袅”，可能就是《金史》卷九十四所谓的“合勒河”（参见伯希和：《圣武亲征录译注》第196页）。其次，《金史》卷十一亦有一河名“辖里袅”，伯希和在《圣武亲征录译注》第198页误译“袅”为hiao（如果不是印误的话）。然则在《金史》卷五十，此河又名“辖里尼要”。由此可以肯定 niao<

'niyo。“尼要”（niyo）很可能在古女真语就有，所以“辖里”的含义也很可能必须求之于通古斯语。“辖里”拟音似为 Yali、Xari。此河可能就是辽上京附近的“曲江”（见施伯：《满洲史地字典》，第502页）。“曲江”是汉语译名，其意义为“弯曲的河流”。因此，“辖里”的含义很可能就是“弯曲”，而与满语 hari（歪斜、弯曲）有联系。所以“曲江”的女真语称呼乃是 'hari niyo。（译者按：《金史》地理志尚有所谓押恩尼要，义为‘狗泺’）。

以上所述可证《契丹国志》所谓“乌”很有可能是“裔”之误，“裔”即古女真语 'niyo，其意义为“水”。因此，宋绶《行程录》所谓虏语谓“讷”为“山”，很可能也要从通古斯语求其词源。前文已经说过，《宋会要》与《契丹国志》提供的写法是有差异的（一作‘讷都’，一作‘胡都’）。在我看来，《文献通考》及其所本的《宋会要》用字也有错，这就是说，“讷都”亦为讹错字。我认为原始文献用字必是与女真语（和满语）“山”字亦即 alin 相当。《金史》卷一百三十五所提供的古女真语书作“阿邻”，后期女真语作“阿里因”（见格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第39字）。乍一看来改“讷都”为“阿都”似是幻想。其实两者的草书十分相近。试比较诸桥所编《大字典》上的“阿”字与“讷”字、“邻”字与“都”字。

这样我们就可以弄清楚，原来《契丹国志》所谓的“胡都”、“乌”都是通古斯语即女真语译音用字之讹。这也表明问题是何等复杂。我们研究辽金史及其它文献上面的所谓国语，便经常要考虑到有这种错字；尤其是在缺乏象 'niyo（‘裔’、‘尼要’）这类用字可资对照的情况下，那就更加困难。

（3）朝定　据《契丹国志》卷一，“朝定”义为“朋友”。这与蒙古语的 nökör、anda、ina、qani 和满语的 gucu、gargan 等都不相合。女真语表示“朋友”的用词是“捏吉鲁”（见格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第329字），乃蒙古借词，出自蒙语 nökör。认为“朝定”即 'čauding 暂且还不能解释。

（4）捏骨地　《契丹国志》卷二十七谓契丹称“跪”为“捏骨地”，其说出自《松漠记闻》。“捏骨地”拟音必为 'negudi。蒙语“跪”为 sögüd-，不能解释这个契丹语词，因为仅有第2、第3两个音节相合。满语称“跪”为 niyakurambi，后期女真语称“跪”为“灭吉鲁”（见格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第466字）。似乎不能排除满语 niyakura- 与“捏骨地”有亲缘关系，因为可将齿音 -ti 解释为齿音 -r- 这样就可重拟“捏骨地”的读音为 'neguri。因此说“捏骨地”是个通古斯语词。

（5）曜辣　宋人江休复的著作《江邻几杂志》（第3页）谓契丹称“圭”为“曜辣”。“曜”音 yao，又音 yue。我还不能解释这个词。

（6）《燕北录》所见契丹语词　《燕北录》成书于1058年，所录契丹语词共七个，均以汉字译音。前述“掠胡奥”（赤娘子）即其一。其它六个契丹语词我现在只能解释一个，即所谓“郭不离”。据《燕北录》第18页，此为契丹刑具，汉言“沙袋”，其形如链枷，上置皮囊，其内充沙。我看这种“郭不离”是与蒙语 güibür（链枷）一词有亲缘关系。参阅列辛（Lessing）的字典第389页，科瓦列夫斯基的字典第2558页。

《燕北录》所载其余五个契丹词，我仅在此列举其汉字译音和汉义，希望阿尔泰语言学家来研究。

据《燕北录》第16页，契丹每于新帝登位时必将新帝匿于帐中而遣亲王入内寻找，此谓“提认天时”（《燕北录》原文为：‘各入帐列何骨朶，汉语提认天时也’）。问题在“列”

字是译意还是译音？

据《燕北录》第17页：汉使进见必齐呼“治兜离”，汉言“万岁”。

据《燕北录》第18页：契丹遇旋风之时皆行祭风仪，祭时七呼“神不剌”（《契丹国志》卷二十七作‘坤不刻’），汉言“魂风”。《契丹国志》所云“坤不刻”，乃出自《燕北杂记》，详见说郛本《燕北杂记》（卷四，第9页）。

据《燕北录》第18页，契丹旗书“蕃珂忍”，“汉语龙虎也”。

据《燕北录》第18页：契丹有一刑具汉名“铁爪”，契丹谓之“鬣觭”。

（7）《燕北杂记》所见契丹语词

除上述“坤不刻”（魂风）以外，《燕北杂记》还著录有三个契丹语词。

据《燕北杂记》第9页：契丹语“呼种田为提烈”。此“提烈”是否与部族名称“敌烈”有关？所谓“××敌烈”是否即“某部种田者”的意思？这当然很难说是辽代的蒙古族，不过我认为还是值得考虑的。

《燕北杂记》第9页有所谓“舍利”，《辽史》卷一百一十六又作“沙里”。卫特夫——冯家昇解作突厥语 sällä，也许就是回鹘语的 säli〔见葛玛丽（Gabain）：《古突厥语语法》，第333页〕。

《燕北杂记》第9页又谓汉人流居北边者常为契丹所辱，詈为“十里鼻”，意即“奴婢”。此词拟音当为*šil(i)bi 或 *šir(i)bi。检《蒙古秘史》čerbi 乃宦衔。道尔弗在《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一书（第305—306页）释作“廷臣”、“侍卫”。若以“廷臣”含义为“宫廷之仆”，且取其另一形式 čirbi，就可将契丹语的“十里鼻”（*širbi）视为蒙古语 čerbi（奴仆）之讹，或者说是蒙古人借用了这个契丹语词。

（8）汉语——契丹语混合诗

《契丹国志》卷二十四录有两首汉语——契丹语混合诗。对此我将另文专论。其中一首乃1044年余靖（1000—1064年）所作，另一首乃刁约（？—1082年）所作。刁约诗出自沈括（1029—1093年）所著《梦溪笔谈》。这两首诗亦见于赵翼（1727—1814年）所著《陔余丛考》。混合诗中的契丹语词均有汉文释义，所以是研究契丹语的重要材料。

最后要着重指出，我们十分感谢门格斯重新挑起了关于辽代契丹语言问题的讨论。我在本文只是抛砖引玉提出一些新问题，这是因为不仅材料缺乏、许多汉语语词常常不能肯定其意义，而且更主要的是，我并非阿尔泰学家。只要契丹文字还未能解通，最好还是把有关契丹语的记载都搜在一起（而不仅限于《辽史》所载）来研究，这项工作应当由阿尔泰学家和汉学家共同来做。

（上接第113页）

实，在这个韵表里表示出来。在十一世纪中期近似的韵母很多区别的西夏语的音韵组织，到十二世纪后半期，已失去了某些区别，开始被统一起来，这个韵表作成的时代或许以既存的手写文本为背景，这是必须考虑的。

我在以前构拟的十一世纪的韵母体系推定形式，在这个韵表中所见到的各韵母的相通关系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这使我非常高兴。

评福赫伯著《契丹语考》

G·道尔弗 著
黄振华 译

本文原题《阿尔泰学家评福赫伯著〈论辽国语言关系〉》（Altaische Scholian zu Herbert Franks Artikel 'Bemerkungen zu den Sprachlichen Verhaeltnissen im Liao-Reich'），载于1969年《中亚研究》(Zentrolasiatische Studien) 第3期，第45—49页。道尔弗的重要著作尚有四卷本《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 1963—1967年）。福赫伯系西德著名中亚学家，现任巴耶尔科学院院长，第32届亚洲和北非人文科学国际会议名誉主席。所著《论辽国语言关系》一文，曾由我改题为《契丹语考》译载于《民族语文研究情报集料集》(第五集，1985年），此文亦多引用道尔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一书。——译者

我常与福赫伯通信讨论契丹语。关于契丹语中的阿尔泰语(或者不如说是所谓阿尔泰语)、尤其是关于所谓通古斯语成分问题，我曾给福赫伯写过一封长信。兹应福赫伯之请，将原信略加修改，附于其《契丹语考》一文之后发表，因为我认为，他的文章乃是对契丹语研究的重大贡献。

1.关于“阿干”——巴津认为这个称呼“可能为前突厥语，亦可能为前蒙古语。”我看这个论断并无根据。突厥语言材料有此 aqa 一词，最早还是蒙古时代的，亦即见于蒙古语借词甚多的其他文献〔即见于乌古斯——藏史诗，民间契约和民歌，参见拙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卷一，第137页；纳捷里雅也夫（Наделяев В. М.）著《古突厥语字典》（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й Словарь, 1969年）〕。古突厥语表示“兄长”的用词是eči，在前蒙古语的文献中则少见（参阅拙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卷二，第15页；纳捷里雅也夫著《古突厥语字典》）“阿干”可能更早是蒙古语词（蒙古语中早就有 aqa 这个词），当然也不能完全肯定（蒙古语—n 不稳定在古代大概没有什么意义，这种情况仅在近代才多见。例如在现代蒙古语中，“词”的读音为ügen，在古代蒙古语则为üge，后来发展成—n，在以前是不曾有的）。因此我坚信，“阿干”也不是源出于蒙古语。倒是可以考虑它出自原始通古斯语* akūn（兄），请参阅本钦（Benzing）著《通古斯语》（Die Tungusischen Sprachen, 1956年）。这里有尾音- n 倒是与“阿干”相合，不过与其 -a- 不太相近。在事实上，蒙古语的 aqa 乃是一个伊呀作语造成的语词，这在许多不同的语言当中往往都是一样的（例如斯瓦希利语的 mama = 德语的 mama，近代蒙古语的axa（兄）= 阿拉伯语的 ax（兄弟）。因此，“阿干”根本不是阿尔泰语词。

2.关于“莫贺”——《契丹语考》引证拙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卷二，

第396、402—404页，认为“莫贺”相当于突厥语的称号词 baɣa即bäg。但是，他却没有注意我自己在该书后文第 460、466、474 诸页已经放弃此说。我认为baɣa是人名而不是头衔。在Toñuquq boyla baɣa tarxan这一群词中，把Toñuquq看作人名而把baɣa看作头衔是不妥当的。更令人信服的是将Toñuquq和baɣa看作人名，而将boyla和tarxan分别视为限定词。因此，古突厥语baɣa根本不是表示称号的词。

3.关于“纥真”——蒙古语gučin <*gutin见于许多通古斯语，而不限于满语和女真语。例如赫哲语有gočin（出自*gutin）、乌勒札语(ultscha)有gutin、鄂洛奇语（Orotschisch）有guti、鄂伦春语（Manegirisch）有 Gutin、鄂温克语有 gučin（较晚的借词）、库尔—乌尔米语（Kur-Urmiisch）有gosin（借自满语）。

4.关于部族名称——在确定部族名称的含义时，最好是要做到论点合乎逻辑而不相违悖，完全可靠是很难做到的。我看在这方面资料还嫌太少。名称学（Onomastik）也同统计学一样，只有依靠大量材料才有意义，这样才能发现一些可以验证的东西，以说明某种语言（或语言基层）的规律。然而就契丹来说，一方面是那些部族名称含义不明，另一方面是材料又嫌不足，所以只能提出一些设想，很少能提出确证。福赫伯在论述“婆离”的含义时，自己也说过这一点。

5.关于“迭鲁敌烈”—福赫伯认为古蒙古语 *diɛ- >ye-。就我所知至今还不能这样构拟。

6.关于“别古”——古突厥语并无 begüt。以-t 为复数据我所知只有两个，而且在这两个形式中（也象在蒙古语中一样）就可代以-n。例如tarxat-tarxan（免税的）、tegit—tegin（特勤、王子）。古突厥语倒是有个bäglär。此外，因为u/ü在突厥语中（不象在蒙古语中那样）并非关联元音（Bindevokal），所以，begüt不可能成立。

7.关于“乙不哥”——认为“乙不哥”出自蒙古语ebüge，这是相当令人信服的。不过在辽代也可能有蒙古语借词，就象阿尔泰突厥语的öbögön那样。

8.关于“拽剌（i—la）——我认为说它出自满语jalan比说它出自突厥语yadaɣ更妥贴，不过也不能肯定如此。阿尔泰学家还不相信满语ja—出自juai（Chuai 拽），因为语音规律的发展不同。详见后文第13条。

9.关于“耨斡么”——认为此语当拟*Nā-ba-eme（nā—ba土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说它是*bú—a—nā eńe 也不妥当。满语ba（地方）即女真语的“卜阿”，可以上溯到原始通古斯语的*buga（至今鄂温克语仍称‘地’为buga），早年满语的“地”字也同女真语一样，至少应当是*bu'a（不过不读作 *buga）。唇音之后的元音u消失，一般都有这种情况。例如满语suwe（你们）即sụę <*söä，但是*böä（我们）却不变为 *buwe即bụę，而是变为 bɛ(至今赫哲语仍作bụę，这清楚地说明其形式的古老）。其次，满语也不称“土地神”为nā—ba，而称为ba-Na[参见豪尔(E. Hauer)：《满语字典》（Handwörterbuch der Mandschusprache，1952年），第64页]（译者按：‘土地神’在《五体清文鉴》作BaNaji）。便是eme（母）亦为后期借自蒙古语，通古斯语的“母”字在满语为eniye即ęńę，相当于鄂温克语 ęnIn。仅此一例就足可说明：弄清“耨斡么”的语源需要克服多少困难！我不相信契丹语中仅有几个通古斯语词。

10.关于“忒俚蹇——此语可能出自tärkän，后者则为突厥语头衔词，详见拙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卷二，第495—498页。

11.关于“耨斡么”——福赫伯在此认为满语non(妹)相当于女真语“捏浑温”，我看靠不住。满语的non可与拉姆特语（Lamutisch）的nū相比，不过它们的语音连系也还不完全清楚。女真语的“捏浑温”（nehūn）似乎同满语的neku（女友）更有关系，相当于赫哲语表

示“妹”的语词nkęu～Nęu（这是方言差异？）、乌的盖语（Udehe）的nęŋu、鄂洛克语(Orokisch)和乌尔札语的nęu、鄂温克语的nękūn、索伦语的nęxū、涅基达尔语(Negidalisch)的nękůn～nęxůn，其含义均为“妹”。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出自原始通古斯语 *Näkō。在索伦语、鄂温克语、涅基达尔语和女真语，此词均有—n，当为依据与原始通古斯语*akūn(兄)的类比而来(‘兄’字在索伦语为axī，在鄂温克语为akīn，在涅基达尔语为axin，在女真语为ahūn阿浑温)。可见满语 non 和 neku 也许是两个不同的语词，而女真语的“捏浑温”（Nehūn）则与后者相当。

12.关于“掠胡奥”——福赫伯认为满语niohušun（光身）的—šun是一个后缀。我所收集的满语后缀表（我相信是比较全面的）却没有这个后缀，再说满语也没有niohu—这个词干。我还认为niohušun同蒙古语 ničügün(赤裸的)没有亲属关系我。想要说的是，niohušun可能是借自古蒙古语的某一形式(也许在满语中产生了音位转换)，不过是完全借用，所以没有必要去找寻特别的满语词干。正如德语kontraktion(契约)乃是全词借用，并无所谓词干 trah—。

13.关于“赤实得本”——满语te—(坐，tebu—使坐)出自原始通古斯语 *tägä（鄂温克语tęgę—），但是有一个问题要弄清楚：原始通古斯语的—g—是在古代女真语中脱落的？还是在辽代契丹语中就已脱落？根据朝鲜方面的资料[参见许列（Hiu Lie）：《朝鲜的满语学》（Die Mandschu-Sprachkunde in Korea），学位论文，1967年]，例如原始通古斯语*toga（火）在现代满语为tuwa即tụa，，古读为tu'ôâ（即tuụa），可见乃是两个音节的语词。但是原始通古斯语的*juan（＋）在古代就读作 jûân即jụan。格鲁贝的《女真语言文字考》有一个女真语词“卜阿”，即原始通古斯语*buga（地），现代满语作 ba <*bụa或 buá(i)。如果考虑到这些情况，那就可以认为至少在11-13世纪“坐”字为 tée—，甚至可能是 *tege-。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不是汉学家，不能解决，因为这至少需要掌握古代女真语的资料。但是一般说来，用满语te—来解释契丹语词是可以的。

14.关于“斡突碗”——我还没有发现满语ote-、ete-有“孳息”的含义。

15.关于“斡突碗——根据语音规律，我不认为突厥语的ud(牛)同蒙古语的aduɣun（牲口、马匹）有连系。

16.关于“监母”——满语kemun（制子、准）人蒙古语 kem <突厥语 käm。

17.关于“仲里”——认为此语与共同通古斯语根*gälā（请）有关，我看这在语音上说不过去。首先因为这是一个动词词根，而静词*gälā（请）则不存在。

18.关于“朝定”——认为女真语的“捏苦鲁”出自学蒙古语的nökör，我看很有疑问。详见拙著《新波斯语中的突厥语和蒙古语成分》卷一，第523页。

19.关于“捏骨地”——满语 niyakura—（即ńakọra—）的首音必须重读：ń- 为原始通古斯语，出自*m̀-（或*mị-）。不仅女真语的“跪”字首音为m-（女真语‘捏苦鲁’），而且赫哲语为mixora-n-，库尔·乌米语为meakora-、鄂洛春语为mexura-、乌的盖语为mäula，均出自原始通古斯语*mịakura-。一种语言如此之早就有ń- <m̀-，是很少有此可能的。

20.关于《燕北录》上其他六个契丹语词，遗憾的是我也不能解释。瞎说一通当然是可以的。不过，我也借海涅士的话说：“瞎猫抓耗子”将一事无成。

福赫伯的文章取材甚广，不能解释的契丹语词是如此之多，这使我再次坚信，契丹语也许即不是突厥语，也不是蒙古语，也般不是通古斯（一般说来，就是非阿尔泰语），或许它是一种至今还不为人们所知的、孤立的、已经死亡的语言(就象苏末语或者乌拉尔特语那样)，不过其中有些阿尔泰语借词，当然，不是通古斯语。